

作家与现
代出版研究



施蛰存

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

张英鸣◎著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施蛰存

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

张英鸣◎著

Shizhecun meijie zhong de xiandai zhuyizhe

此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成果
编号: 09YJA751010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 / 张芙鸣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5

（作家与现代出版研究丛书）

ISBN 978-7-5406-9551-4

I. ①施… II. ①张… III. ①施蛰存（1905～2003）—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9220号

策划统筹：邱 方

责任编辑：王 亮

责任技编：杨启承

整体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印刷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十三社西乡工业区B栋）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5印张 300 000字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9551-4

定价：2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序 言

施蛰存先生与世长辞已经九年了，对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学者，理应受到持续的关注和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不计算单篇论文，九年来我只见过两种研究专著，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杨迎平著，2007年5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初版）和《现代之后：施蛰存1935—1949年创作与思想初探》（王宇平著，2008年5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初版），后一种还是海峡彼岸出版的，可见施蛰存研究现状态不如人意。因此，当读到张芙鸣女士这部《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书稿时，我的欣喜也就可想而知了。

话又得说回来，研究施蛰存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这大概也是目前施蛰存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施蛰存具有多种文化身份，他不是一位单一的作家，只会写写小说和散文，而是正如他自己一再所说也已经广泛流传的，他一生开了四扇窗，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古代碑帖研究。他这四扇窗，每扇都开得很大，开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因而，研究者面对这样一座矿藏丰富的文化大山，自身的学养、识见和可供利用的学术资源很可能远远不够，能够登堂已经不错了，如何再窥堂奥，再深入研讨？对这一点，施蛰存自己已有充分的估计。他生前就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某某研究我，他是好意，但他实在不懂，一些常识都弄不清楚，怎么研究呢？（大意）所以，选择研究施蛰存，在学术上是个不小的挑战。

本书作者长期研究施蛰存和“新感觉派”，已经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她这部新著又独辟蹊径，把施蛰存1949年以前多姿多彩的文学传播活动与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分析探讨，对施蛰存的文学成就作出了新的评估，也使本书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施蛰存文学前传。

即使不算早期发表旧体诗文的《兰友》，施蛰存1949年以前

的文学传播活动几乎与他的文学创作伴随始终。从《瓔珞》到天折的《文学工场》，从《无轨列车》到《新文艺》，从《现代》到《文艺风景》，从《文饭小品》到《现代诗风》，从《活时代》到《大晚报》副刊《每周文学》和《剪影》等等，施蛰存或主编、或合编、或当发行人，他的文学传播活动实在是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主编的《现代》，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影响深远。施蛰存参与文学传播活动的时间之长，主编刊物之多，简直直追新文学巨子鲁迅。直到晚年，施蛰存还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词学》丛刊，风华不减当年。或许可以这样说，施蛰存一生实际上不止开了四扇窗，还有第五扇，那就是文学编辑之窗。

本书正是对施蛰存这第五扇窗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书中的描述不仅是全景式的，而且可圈可点。不妨举个例子。施蛰存早期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学杂志，大都带有同人刊物性质。从主编《现代》起，施蛰存改弦更张，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倡导现代派文学，又提供一个让各种倾向的新文学家传播其作品和评论的尽可能宽广的平台。本书从商业运作下的《现代》、“新型知识传播的《现代》”、“作为物质与技术形式的《现代》”、“现代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现代》等多个角度切入，深入论述了施蛰存如何主编这份“一·二八”事变之后“崛起于城市废墟”中的大型新文学刊物。书中把《现代》置于“新型知识传播”的背景之下，详细分析施蛰存通过《现代》的“编辑座谈”（后改称“社中座谈”），传递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指出施蛰存在实践现代派文学的同时，也主动承担起文学教育者的职责，“力求使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发生在创作者、研究者层面，更能在处于知识转化中的大众读者层面展开”，而这正是以前的施蛰存研究者很少论及的。

当然，本书的亮点还有很多。作者视野开阔，论证有条不紊，阐释施蛰存的文学传播活动，无论编辑、出版还是翻译，都着力揭示其与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关联，与他的文学追求的关联，与30年代新文学态势的关联，乃至与整个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关联，从而使全书增加了厚度和说服力。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20世纪80—90年代与施蛰存先生有不少交往，但我有自知之明，没有专门研究过他的文学创作，更遑

论其他几扇窗，只为他编过《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北山散文集》（上下）初稿、《老古董俱乐部》等几种著译集而已。承张芙鸣女史不弃，要我为她的新著写几句话，只能就阅读所得略陈鄙见，但愿这部新著的问世有助于施蛰存研究和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深入。

陳子善

2012年10月20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目录
Contents

序言〉〉〉1

上编 施蛰存出版活动研究〉〉〉1

第一章 旧文学读者与新文学作者〉〉〉2

第一节 旧文学读者的新文学阅读〉〉〉2

第二节 小说习作与发表经验〉〉〉10

第三节 大学时代的写作、结社与办刊〉〉〉20

第二章 初涉文坛时的出版编辑活动〉〉〉26

第一节 《无轨列车》与“无轨艺术”〉〉〉26

第二节 水沫书店和《新文艺》月刊〉〉〉34

第三章 《现代》杂志的话语实践（上）〉〉〉43

第一节 崛起于城市废墟中的《现代》〉〉〉43

第二节 新型知识传播中的《现代》〉〉〉48

第三节 作为物质与技术形式的《现代》〉〉〉51



第四章 《现代》杂志的话语实践（下）》》》61

第一节 《现代》杂志与“现代的”文学》》》62

第二节 《现代》杂志与“自由的”文学》》》76

第三节 《现代》杂志的转型及“现代派”文学实践终结》》》86

第五章 “个人主义”思想与编辑价值实现》》》97

第一节 从《文艺风景》到“个人风景”》》》97

第二节 个人主义与“小品热”》》》106

第三节 “《庄子》与《文选》之争”及30年代的古籍出版活动》》》115

第六章 翻译与文学现代意识建构》》》130

第一节 翻译：新文学的一支》》》130

第二节 施蛰存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138

第三节 显尼志勒对施蛰存的文学性影响》》》152

下编 施蛰存出版活动史料》》》167

一、施蛰存文学出版活动年表（1921—1949）》》》168

二、出版言论小集》》》182

三、《现代·编辑座谈》选编》》》197

参考文献》》》222

果子盐、牛肉汁及其他——代后记》》》228

上编

施蛰存出版活动研究





第一章

旧文学读者与新文学作者

第一节 旧文学读者的新文学阅读

1910年，清宣统二年，施蛰存六岁。这年阴历元宵节刚过，父亲为他举行了开蒙仪式，当日的情景，老年施蛰存回忆道：“堂中铺红毯，烧红烛一对。先拜至圣先师神位。家君坐太师椅上，教读‘天地君亲师’五字，命我讲诵三遍，礼毕。”^①次日清晨，施蛰存被父亲送往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拜师大礼之后，从书包里拿出来的第一本读本《千字文》。

施蛰存入私塾半年就背熟了《千字文》，这就意味着他在半年内认识了一千个字，这一千个字背后的意义，如他所说，“并不是毫无所知”，实际上已经对他日后的做人行事框定了规矩；小学教育仍以强化修身立德为根基，诸如“父母在，不远游”、“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等，实际上是对私塾教学的延伸。回想起来，他对这种旧式教育体制有深切感怀：“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办法，现在也很不反对了。”^②

施蛰存走入知识领域的方式和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从私塾开始。私塾教育作为私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战国以来，在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递中，都承担着重要作用。在官学触角触摸不到的底层，私塾主动担负起开启民智的责任，它教儿童从识字开始，进入修身立德的程序，智德并进，以德为重；虽然私塾教学有自己的风格和体系，但它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教育目的与官学一致，都是要确保儒家理学的统治地位，辅助

① 施蛰存：《沙上的足迹》，19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② 同上书，71页。

完成道德规范。实际上，这种非体制性的教育形式一直更密切地靠近传统道德体系，以民间的形式建构着传统文化知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当官学被迫中断时（比如政治混乱或战争时期），是私塾延续了传统教育的功能，它对官学的补充，使传统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被严格化、规范化。私塾之“私”，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个体化或民间化，教育的内质仍是与“公”、与“官”相一致的。

成长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沐浴着西学思潮的新型知识分子，大都有过私塾经历。他们一方面积极地用西方现代思想改造传统文明，另一方面对早已深入骨血的道德养训和传统知识形态有种无法割舍的依恋，其中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从梁启超到蔡元培、陶行知等大力鼓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以身兴学的武训给予过高度评价：梁启超写过《武训传》，蔡元培曾撰文《武训先生提倡了我们》，陶行知则概括出“武训精神”，并提倡以“武训精神”自励励人。近现代史上许多拥有先进意识的思想家、革命家或文学家在回忆到私塾经历时，都曾对这种教育方式充满眷恋和肯定，马叙伦曾在《我在六十岁之前》一书中写道：

那时做文，都是预备将来考试中秀才举人的，因为那时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诗是要讲对子的，所以从小就要来讲柳眼、桃腮、飞絮、游丝、青云、赤日、乱头风、长脚雨、红板路、白门潮，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五个字能对，就成了一韵诗。譬如先生出个“一团蝴蝶梦”，我们对个“几处鹧鸪声”，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

我当时只能对到二个字，但是他老（私塾先生——笔者注）出口，我就对上了。……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尤其是我，向来一窍不通，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

即使是对传统道德教育深恶痛绝的鲁迅，在回忆起儿时的私塾经历时，也有种温暖和煦的情感蕴藏在文字里，与他一贯的言辞激烈、剑拔弩张形成鲜明对比。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他这样描写私塾先生：

……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屋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喏——……。”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鲁迅先生笔下的私塾先生并不是封建社会妖魔鬼怪的化身，而是一位和善有趣的老者。鲁迅在回忆里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童年，衬托出他在现实中的孤独感。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试图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重塑一个具有开放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北京大学，但在1918年，他却发起成立“进德会”，对甲乙丙会员分别制定不嫖、不赌、不纳妾，及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规定，^①这个会的会员还有李大钊、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人，他们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蔡元培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修养来促进学术发展，这实际上是向儒学道义进行回归，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里也给了儒学一席之地。这与他思想体系中传统道德规范的牢固支撑有密切关系。蔡元培六岁始入家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所谓三部小书，后来续读“四书”、“五经”，长大成人之后，他自己也曾做过私塾先生。可以说，他是在旧式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式教育家。

私塾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它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成长，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专门问题。笔者在此仅从媒介的角度，给予浅显的论述。虽然在民间，私塾门派种类特色繁多，但他们使用的教材都比较集中，识字书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道德教育主要用《性理字训》、《弟子规》、《小儿语》；历史读物选用《历

^①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57页。转引自[美]微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5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代蒙求》；诗歌教学用《神童诗》、《千家诗》及朱熹的《蒙训诗百首》等教材，^①这些教材的编写体例依据相同的内容和格式，作为印刷媒介，它们把儿童引入知识和道德领域的方式也是一致的。正是严格的形式和套路，使孩子们在进入封建正统文化之初，兴趣、娱乐等个性化需求被泯灭掉了，他们被迅速纳入统治者驱动的文化社会结构中，“儿童的形象是社会文化不均衡的支配性话语再生产的显著表现”，“儿童的教育和习得过程对于维系剥削关系十分重要”。^②在私塾教材的编写中，我们能意识到封建教育的专制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和睦，夫唱妇随。”这些“德训”被整齐地排列在教科书里，没有句读，需要先生指导“断句”，示范乐感，孩子们被引导着在吟唱的“游戏”中似懂非懂地记住了传统道德的形式。随着时间的延续，经验最终变成意识，直到他们成为这种体制中的成员。面对这样的教材，儿童完全没有能动性。那些成长起来的新思想新文学家们，正是在早期教育中，被“非自觉”地塑造成传统社会文化中的一员，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以内在“成员”的身份而不是外在“他者”的身份推翻这种制度，正是在传统文化浸淫中成熟的知识分子，才获得了活生生的批判对象和批判资源。

从另一个角度说，早期教育形式使儿童通过感性的方式继承了文化经典，比如对于诗歌的学习。汉语诗歌的音律美在早期私塾教材的印刷中是体现不出来的，私塾先生的身体姿态和声音引导才是学习诗歌的重要参照。在诵读中，孩子们体会到诗歌的优美之处，逐渐养成欣赏的乐趣。关键是声音的多种因素帮助他们记忆。所以，他们对于诗歌的体验，首先是与声音的记忆有密切联系。传统诗歌在很多新文学作家那里仍拥有深刻记忆，就是得益于强化的教授形式，而新诗却是在读者心里被理解和默记的。

勒内·韦勒克曾批评诗歌的这种诵读形式，认为：“一首诗每诵读一次就要比原诗多一些东西：每一次表演都包含了一些这首诗以外的因素，发音方面独特的气质、音高、速度、轻重音的安排，这些因素要么是由朗读者的个性决定的，要么表明了他对这首诗解释的方式。”他认为这些因素并不包含在该诗当中。“诵读一首诗并不是这首诗本身，因为我们能在心理中校正这

① 王凌皓等编著：《私塾·科举》，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② [英]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鲍妍文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25~2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

一诵读的表演。”^①诗歌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超越，其中诗歌接受方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因素。随着媒介形式的革新，被印刷的新诗分行整齐地排列，并且排列方式与音韵有鲜明的对应关系，汉语诗歌这一经典文学体裁的优美之处显现在报刊、杂志、书本上，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经验认识诗的本质。所以，韦勒克说：“它们（指印刷）的存在证明现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印刷是非常重要的，还证明诗歌不仅是写给耳朵听的，也是写给眼睛看的。”^②

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走到多远，无论自觉有多么强烈的西方现代意识，他们永远都不会变成西方知识分子的化身，不会拥有他们那种思维方式，因为他们所怒斥和反对的东西，有时也正是自己的养料，而且传统也在不断被“消化”，以另一种形式被“适应”，所以，我们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就变得异常复杂艰巨，难以一概而论。事实上，经过时间的论证，越是被推断为可靠的现代性文本，离传统的距离也往往越近。

施蛰存出生于世代儒生之家，父施亦政，是浙江仁和县学生，入学后即以佣书授徒为生，并在陈霞起家坐馆。^③对施蛰存来说，父亲是他接受正统文化活生生的媒介，父亲有十二个书籍的藏书，是节衣缩食买来的，藏有经史子集，及诸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可唯独没有小说，这使小学二年级的施蛰存不得不把母亲给的零用钱积攒起来，星期日到东岳庙书摊上去买小说看。他看的第一部小说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小说吸引他的是故事，而他对词曲韵律似乎也有很大的兴趣，自己买的第一本戏曲书是似懂非懂的《蕉帕记》。^④这时的择书行动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某种程度上成为他日后文学活动的隐喻，比如他选择《水浒传》中的石秀作为日后心理分析小说巅峰式的尝试，比较成功地完成了文学上由真实到虚构的飞跃，作为一种写作技术，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这与儿时对《水浒传》的深

① [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② 同上书，160页。

③ 沈建中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中的《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20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④ 施蛰存：《沙上的足迹》，71~7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刻印象有关；而中年之后的施蛰存把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其中很大精力放在词学研究上，这也与少年时代对词典的兴趣有关，他不仅将之视作生存之道，而且这是他有意识地向传统经典文化回归的明确方式。

1918年施蛰存高小毕业，升入江苏省第三中学读书，至1922年中学毕业。这段时间，他有一段比较丰富的“自由”阅读经历，所谓“自由”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阅读，而兴趣又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施蛰存的成长经验而言，他在中学时代的阅读选择基本上符合正统教育对青年的期待，比如，中学国文教师常以唐传奇作为教材发给学生阅读，他读过《龙威秘书》，但“不以为文章也”，并且当时“同学中亦有家长对徐师有微词，以为不当用小说作教材”；^①施蛰存自己坦言，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最初所致力的是诗。^②先是热衷宋诗，从《散原精舍诗》、《海藏楼诗》一直读到《豫章集》、《东坡集》和《剑南集》，后来又读唐诗，《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都未逃过他的阅读视野，他读宋诗学做七律，被批“神似江西”，喜不自胜；读唐诗则推崇李长吉。前者“无一字无来处”，风格奇硬拗涩，后者又尚堆砌辞藻，幽深奇谲；对此两者的喜爱，表明传统的经典作品在他的阅读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还影响到他的精神气质，中学时代的施蛰存热衷于和文友挥扇品茗，论文言志，臧否古今，一派文人雅士的风尚。这样，在首次读到胡适的《尝试集》之前，他是一个典型的旧文学读者。

新文学审美意义的确立在以往的研究中，作品和作家是主体，这方面的成果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它是以怎样的形态进入阅读，以及阅读是如何“阐释”新文学作品，读者又是如何认识新文学作家的，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以施蛰存为个例，从他对新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表现，来探讨读者怎样在阅读中改变了经验世界，确立了新的文学观念，这是笔者要做的尝试。

同是新文学创作，当施蛰存读到《尝试集》和《女神》时，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者，他说：“我以一个暑假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新

① 施蛰存：《沙上的足迹》，19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②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见《灯下集》，72页，上海，开明书店，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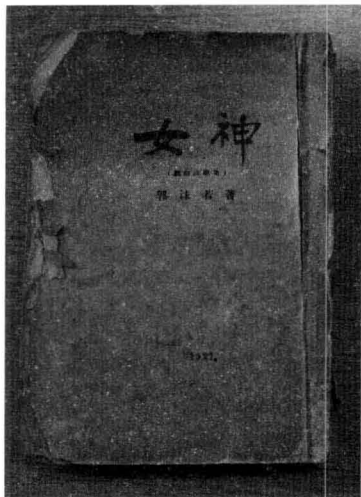
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

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我以为那不如索性做黄公度式的旧诗好了。”对于后者，他“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①笔者以为，这两种阅读反应上的差距，源于以下因素：

首先，《尝试集》初版印行于1920年3月，《女神》初版印行于1921年8月，两者相差一年多，时间差距给了施蛰存接受新文学更多的缓冲空间，作品文本的陌生感逐渐淡化。读《尝试集》时，作为一个“真实的”读者，施蛰存对作品的判断几乎完全来自以往个人的趣味

和既有的文学欣赏规范，这就是诗应该是有韵律的，是应该遵守形式规则的，内容应该是高度审美化的，可《尝试集》的形式松散，语言浅白，内容有些莫名其妙，这样的“诗”，以传统诗观来衡量，当然不是诗；到《女神》问世时，施蛰存对新诗有了阅读准备和进一步期待，交流就不显得特别突兀。

其次，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文本的文学性与接受的文学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雅科布森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文学性”的实现，不是作者单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到读者。只有当物化形态的文本被读者实际接受时，能引起读者的审美愉悦，它才体现出文学性，才能被当作是文学作品。读者的参与非常重要，“从文本到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文学欣赏，能否使文学文本实现其文学价值，决定的是接受者的眼光、态度”^②。虽然《尝试集》给文坛带来新的实践主张，被新文学者充分肯定，但是在施蛰存这里，它没有给他一种审美愉悦，即没有释放出它的文学性，诗的俗白和缺乏含蓄，在施蛰存看来是缺乏审美性的表现，满足不了他的审美期待，也就不能成为诗的文本。而读到郭沫若的《女神》时，他“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



郭沫若所著《女神》初版封面

①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见《灯下集》，74页，上海，开明书店，1937。

② 王先霭：《文本的文学性与接受的文学性》，载《汕头大学学报》，2007（5），1~5页。

精神上是诗，说明《女神》的意义对作为读者的施蛰存产生了灵魂触动，发生了一定的审美效应，审美效应意味着生成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或深或浅，但的确改变了读者的认识。《女神》澎湃的激情、赋有召唤力的语言和对现代人内力的挖掘，是改变施蛰存对诗歌认识的强大动力。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指出，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其诗中许多名词直接来自人的身体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从这里爆发出来的力量和情感，“像火一样烧着，像潮一样拥着”^①。《女神》处处充满了冲动和鼓励：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骚动的情绪和无尽的力量，与十七八岁青年内心某些隐藏的冲动相吻合，形式之“乱”无处不在地呈现出破坏性力量。对旧时代的读者来说，“女神”的命名本身比“尝试”更具有吸引力，它不仅是西方舶来词，还是性与爱的隐喻。对于被旧形式框定的灵魂来说，阅读《女神》，就是一个释放自我和自我补偿的过程。如同霍兰所阐释的一种模式：“体现于文学作品中的精神过程不知怎么成为发生于作者内里的一个过程，而文本中那些‘外在’东西则感到他自己‘内在’于你我头脑之中了。”^②

施蛰存对新诗的阅读充满反思，他几乎是一个“理想的读者”，所以他的评价可以代表文学批评。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被阅读中不断发问和重新阐释形成的，《女神》等新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它建构的是读者对新文学的认识，它更重要的贡献是造就了新型读者。而新的读者又造就新的文本，新的阅读观念又是新的文学形态的基础。相比之下，那些不能被新型读者所接受的文本很难说是新的文学观念和意识的代表。

^① 《创造周报》影印本，第1集第4号，7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② [美] 诺曼·N·霍兰著，潘国庆译：《文学反应动力学》，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